

蒲实 陈赛 等 / 著

# 大学的 精神

教育是让一个人  
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

蒲实 陈赛 等 / 著

# 大学的精神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的精神 / 蒲实等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086-6899-4

I. ①大… II. ①蒲…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西方  
国家 IV. ①G6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6238号

大学的精神

著者: 蒲 实 等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3.25 字数: 316千字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6899-4

定价: 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 文丛总序

## 倡导生活与知识生产

《三联生活周刊》创刊之际，为自己确立的定位很有想象力：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10年之后，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这本杂志做了一项挺有勇气的决定：用五期杂志的封面故事，做一个超大型的抗战历史报道，纪念中国人民的奋斗与胜利。

媒体对历史进行报道，并不稀奇，甚至新闻本身也经常自我标榜——“历史的草稿”。只是，当杂志已经运行10年，各项报道手段日臻成熟，这个时候，周刊独特的新闻方法论对历史的发现与叙述是否有所贡献，以资证明自己存在之价值，才是挑战。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当然不错；只是，这部草稿的构成，是无数需要重新整理的碎片（新闻）。既然如此，我们的历史报道，在尘埃落定、草稿成形，历史事实被无数学者再三甄别，意义与价值日益分明，共识逐渐形成之际，可否反转回来，仍然将宏大历史“碎片化”呢？——碎片化本身，是一种传播技术与手段。用这种手段让概念的历史“新闻化”，并借此重新回到陌生的历史现场。如此，宏大的命题在事实与细节背后，也在传播的快车道上，是双赢。

主意既定，每期抗战主题封面之下，我们以一个“七天单元”承载对当期主旨之“事件报道”，其间“每天”单独成篇，每篇单独立意。有结构的七个

“碎片”——历史现场的“事件新闻”，构成了战争不同时期的意义与价值，也构成了历史的连续性。

其实，如果你有意将新闻或报道当作一项技术来研究，它也是常常会让人着迷的。

2005年，对《三联生活周刊》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创办10年之后，它开始腾飞。杂志的销售量当年翻番，并由此走上长时段的增长之路。

为什么是这一年？很显然，我们被广泛关注的超大型的抗战历史报道，是重要原因。那么，支撑杂志起飞的历史报道，其成功的内在机理又是什么？我们的新闻方法论，最终自证了什么？三年后，清华大学邀请我去做演讲，分享《三联生活周刊》的新闻生产，到了这会儿，我找到了我们历史报道成功的原因。我们生产的不是新闻，而是知识。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伟大时代，与时俱进的知识，是稀缺商品。

所谓知识，简单说来，无非在对抗人类遗忘的过程中，比新闻存活的时间更长而已。也许，很偶然，有些知识，还能存活更长，成为常识。

在21年的时间里，《三联生活周刊》秉持着自己的使命：生产知识。这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我们有自己的方法论。

当然，生产知识，对杂志来说，是理想与使命，它是否达成，有待更长时间与更多读者的检验。如何检验？这份杂志自身存续多长，以及它与读者、时代和国家形成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是一种检验；把杂志有价值的内容编辑成一本本书——最基本的知识的载体，则提供了另一种检验的可能。

现在，这些书，一本一本编辑出来了，它是否生产了知识，是否有可能更长久存续，且看时间的选择了。

李鸿谷

2016年7月31日

# 目 录

文丛总序 倡导生活与知识生产 V

## 第一章 哈佛大学：从绅士到精英

美国的镜子	002
处于守势的帝国	008
在哈佛学什么	028
以政治为业——一个专业学院的样本	053
哈佛人劳伦斯·萨默斯	059

## 第二章 耶鲁大学：卓越灵魂与领袖的摇篮

精英主义、公民使命与自由教育	072
精英主义、自由教育和领袖的摇篮	076
友谊与权力的传奇：耶鲁的秘密社团	108

### 第三章 斯坦福大学：硅谷的心脏

- 梦想家的孵化器\_\_\_\_124  
从工程师到企业家\_\_\_\_141  
谢青：斯坦福与硅谷岁月\_\_\_\_151

### 第四章 麻省理工：一个让想象飞翔的地方

- 麻省理工学院的魔力\_\_\_\_162  
麻省理工学院的人物\_\_\_\_171  
下一站，火星\_\_\_\_194

### 第五章 牛津大学：现代绅士的摇篮

- 牛津的时间\_\_\_\_208  
莫德林学院的时空\_\_\_\_212  
基督教堂学院：消失的时间\_\_\_\_220  
墨顿学院：关于创造力\_\_\_\_236  
财富的精神：牛津与世界\_\_\_\_242  
走向开放的大学精神：寻找以赛亚·伯林\_\_\_\_251  
牛津式的学问\_\_\_\_259

## 第六章 剑桥大学：一个完美的读书地方

剑桥神话	268
800 年造就的精神地图	275
理解一只蝴蝶的智力挑战甚于宇宙	319
真正理解任何一种现象都是很难的	330
剑桥的女孩、女士、女教授	339

## 第七章 海德堡大学：一个思辨之地

寻找马克斯·韦伯	348
海德堡：哲学家路过之地？	379
海德堡大学：一所“很好”的德国大学	398
后记	405
作者名单	415

## 第一章

# 哈佛大学：从绅士到精英

## 美国的镜子

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仅仅是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关乎学问，影响终身的学问，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而这些投资会产生我们无法预测且常常是无法衡量的收益。

——德鲁·福斯特（哈佛第二十八任校长）



走进哈佛园，那些殖民风格或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罗马式的公共大厅和哥特式的教堂，还有爬满常青藤的古老红砖墙……如果说美国人对哈佛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大概与这种漫长时光所凝固的尊严有很大的关系。借用艾伦·布卢姆的话来说，那是“一个最沉溺于实际生活的民族向沉思生活表达的敬意”。

哈佛创立者的意图至今仍然镌刻在哈佛中心校园门口的墙上：“在神让我们安全抵达新英格兰之后，我们建立家园、提供谋生必需品，设立方便地点好敬拜神，也组建公民政府。紧接着我们最渴望的事情之一就是推进学习，并使之延及后代，唯恐当我们的现任牧师归于尘土时，留给众教会的是一群茫然无知的牧师。”

当时，乘坐“五月花”号客船的102名乘客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颠簸，于1620年初冬抵达北美大陆，因为艰苦的环境和疾病的困扰，仅有53人活到了第二年的初冬。这些定居新大陆荒野中的第一批移民如此深信教育对他们决心创立的美好社会的重要性。16年后，他们就在一条叫牛津的破街上建造了哈佛学院。140年后，这个世界上才有了美国。

在《哈佛世纪——锻造一所国家大学》中，作者理查德·诺顿·史密斯认为：“哈佛的创办为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大学传统，这是它真正的重要性。到美国进行独立革命，摆脱英国的统治时，每个重要城镇和差不多每个教派也都有了学院。有些人认为这是危险的趋向，是美国在学校方面重量不重质倾向的开端。可是后来进修高等教育的方便所带来的好处，要比回学校较难的大学制度保持极高标准的好处有价值得多：它鼓励多样化，使美国社会不至于产生单一而狭窄的受教育阶级。”

100年前，查尔斯·艾略特，哈佛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校长曾说：“在任何社会中，高等教育机构都往往是一面鲜明反映该国历史与民族性格的镜子。”

比起欧洲或者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美国人在高等教育上投入的财富和寄托的野心都是罕见的。他们认为大学应该追求真理，钻研高深学问，永远站在理解与反思社会的制高点，同时又希望它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他们将大学视为一种公平高效的精英筛选机制，将智力上最为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推送到社会上层，发挥他们的潜力，以便更好地领导这个国家；同时又认为教育应该是关于个人的心智与个性成长的，对每一个普通学生的人生负责，拓宽他们的视野，以便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碰到“较少地阻挡他们获取成功的障碍物”；他们还相信，大众教育是美国民主的基础，大学应该为社会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如果大学教育误导了学生，吞下恶果的终将是整个国家。相反，如果大学能教会学生准确自如地表达思想，清晰地思考，严密地分析问题，富有道德感，对国家大事敏感而有见地，社会将受益无穷。”

自从独立革命第一次将哈佛学院推上国家舞台后，它作为一所大学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之间的命运就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独立革命期间，哈佛学院曾经一度关闭，用作军营。《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中有八位来自哈佛，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当时接受了哈佛的荣誉学位。从此以后，哈佛毕业生持续影响着美国的政策，其中八位总统都是哈佛人。

直到今天，哈佛仍是映照美国最清晰的一面镜子。一方面，哈佛——就像美国——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最前沿的科技、遍及全球的影响力。全世界的人千里迢迢来到哈佛校园，摸一摸约翰·哈佛先生铜像的脚，就像他们到美国，总想在自由女神像前留个影。就像这个国家一样，从很多方面来说，哈佛都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地方，成功地融合了各种肤色与民族，但它的阶级分化也日益严重。“二战”以后，哈佛在科研上越来越成功，汇聚了越来越多的诺贝尔奖得主，但代价是文科不可避免地

衰落，以及本科教育方向的迷失。它对于这个世界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常常伴随着对于“目的感”以及最初之精神理念的深层的不安全感。

因为美国人骨子里的实用主义，什么事情都要问一句，到底有什么用？人文学科在过去几十年是受到质疑最多的。那年在斯坦福采访，一位意大利文学教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起，经常有学生质问：文科的价值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但丁？最后他无奈地回答说：“读点诗歌和小说，有助于你们科学家培养想象力。”在哈佛也一样。只不过人们会更含蓄一点。《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罗斯·杜塔特在哈佛读书时，选的是历史与文学专业。有一次他问导师，这个专业对他意味着什么？导师说：“你知道，如果你想去咨询公司或投行，历史与文学学位不会有什么妨碍。”

2012年，《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报告，分析为什么这么多常青藤的毕业生跑去为华尔街工作。2011年的数据显示，17%的哈佛毕业生去了华尔街，耶鲁是14%，普林斯顿则是36%。“多么荒谬的数字！”这位作者评价说。他最后的结论是常青藤的教育出了问题。他们自称“自由教育”，却既没有教会学生怎么生活，也没有教会他们如何谋生。学生们在大学里读着笛卡儿、研究着恐龙灭绝的原因，毕业后所找的工作，却与所学毫无关系。这些人聪明绝顶、精力充沛，却完全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华尔街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困惑，将这些美国最年轻最有才华的头脑网罗至麾下。

哈佛教育是“自由教育”——在自由探究精神指导下的不预设目标、不与职业挂钩的教育。这是哈佛近400年的历史上从未背弃过的原则。

“自由教育”最早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他认为，人的生活有“鄙俗”和“高尚”之分，前者以“劳作”谋生，后者则以“沉思”为理想。自由人应受的教育即“自由教育”，其目的是人的理性的自由发展和德行

的完善。“自由”就是不“鄙贱”、不“卑陋”。后来，古罗马的塞尼卡将 liberalis 的内涵由“自由人”转变成“使人自由”，即心灵解放的含义。也就是说，自由教育是与灵魂相关的教育。

每当哈佛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边界变得过于模糊时，“自由教育”就会像一个人身体的免疫系统一般，急吼吼地亮起红灯。哈佛每二三十年一次的通识教育改革是最容易踩到红灯的，每次改革引发的争议，按一位教授的说法，“比迁祖坟还热闹”。因为作为自由教育的“公共面孔”，通识教育到底要教什么，什么知识或方法是每个学生都应掌握的，如何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这些问题往往牵涉到一所大学最深层的自我认知，以及它对于知识与教育最基本的哲学与态度。

哈佛第一次尝试建立通识教育框架是在“二战”后。美国作为“民主”“自由”的一方对抗苏联危险的“集权主义”，知识的共同基础只能落在“价值观”上。人文学科内含的西方文明遗产，社会科学所承诺的对普通生活的理性分析，以及自然科学作为现代化的进步力量，都完美地符合整个计划——以通识教育培养优秀公民，以优秀公民促进民主社会。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经历过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反文化动荡和越南战争的幻灭，无论学生还是教授，都已经厌倦了所谓的“共同价值观”“规则”“大课”，新的核心课程不再试图传授“价值观”，而是传授获取知识的“方法”——长久以来西方文明对“善与恶”的道德判断变成一种“道德推理”的智力训练；“二战”的历史可以与朝鲜的历史平起平坐，都是一种分析方法。就科学而言，你可以选择《人的进化》，也可以选择《恐龙与其亲属》……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大学已经在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运作和进步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学校研究经费在联邦政府预算中的份额稳步增长，各类机构也都认识到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大学教授开始成为政府、公

司、大型基金会的顾问并备受瞩目。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教授总能进入内阁或者占据其他要职。还有什么比“方法论”更安全、实用的共同基础呢？

从 2002 年开始，哈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通识教改。此时它与美国所共同面对的，是“9·11”事件后对于世界的恐惧与茫然、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科技革命的剧烈冲击，以及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在这样一个极度不确定、不稳定、深度割裂的时代，怎么理解哈佛本科教育的共同基础？共同的知识核心要放在哪里？

教授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继续强调方法论，还是来点实在的干货、具体的事例？应该给学生更多的自主权，还是给他们更明确的指导？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分割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与比例？如何确定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轻重缓急？知识与所希望培养的能力之间是否真的有那么大的关联？科学到底要如何纳入自由教育的框架？哈佛的学习经验应该更多地与外部世界连接，但分寸要如何把握，才能避免过度功利化的嫌疑？国际视野与美国价值观之间到底如何平衡？哈佛到底想做一所世界大学，还是一所美国大学？

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仍然是，到底哪些知识可以纳入“核心”的范畴？比如宗教，就是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英语系教授路易斯·梅纳德曾经提议单列一个“理性与信仰”（Reason and Faith）的知识范畴，关于宗教的学习能帮助学生理解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鼓励他们思考 21 世纪一些最棘手的问题，比如宗教暴力的文化冲突、关于干细胞或克隆的伦理学分析等。但这一提议遭到科学教授们的激烈反对，比如哈佛的明星学者史蒂芬·平克说：“把‘信仰’与‘理性’两个词平行放在一起，就像把天文学与占星术放在一起，说这两种思考方式是平等的一样。大学是关

于理性的，纯粹而简单。在这里，除了宗教机构之外，信仰没有立足之处。而且，我们的社会也不缺这个。”最后，通识教育委员会达成的协议是，把宗教相关的课程列入其他的范畴，比如“文化与信念”(Culture and Belief)，在类似“人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课程中可以触及宗教问题。

另外，随着学科之间边界的倒塌（比如生物学已经逐渐拓展到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边缘），为各个学科的知识整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要怎么贯穿到学生的教学中去？著名生物学教授E. O. 威尔逊就认为，未来最好的教学方法不是基于学科，而是基于问题，一上来就抛出那些不仅与学生个人切身相关，而且对人类亦影响深远的大问题，比如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里已经贯穿了物理、化学、生物、道德、法律等多个不同的学科，逼迫学生从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人类共同体验的核心成分。

## 处于守势的帝国

在世界大学里，哈佛拥有无上的财富、权力与荣耀。它不是象牙塔，而是帝国，以知识和思想为权力来源的帝国。它与外面的现实世界较量与合谋，斗争与妥协，进攻与防守，捍卫精英主义和学术自由。

### 哈佛学院：贵族与精英

来到剑桥镇，不由得感到自己得一本正经一点儿。比如，在电梯里遇到当地人，他们会机械性抽搐般咧嘴，闪现两排牙齿，再弹簧般复原，瞬

间完成微笑，克制、冷漠、彬彬有礼。波士顿的英语速度很快，还残存着英式腔调。幸好哈佛若干年前就不再要求学生的装扮必须是西装领带皮鞋了，免了着装的烦恼。

或者，是哈佛校园和它周边那些殖民风格或新古典主义的建筑、罗马式的公共大厅和哥特式的教堂，还有爬满常青藤的古老红砖墙，把上了年头的时间凝固成老者的威严感，让我被看不见的先辈和无法描摹的传统摄了魂魄。即使是在哈佛最躁动叛逆的1969年，激进抗议的哈佛学生在占领哈佛主楼后，曾有示威者问，是否要砸掉文理学院院长的办公桌，也立即有人站出来反对：“绝对不行。那可是查尔斯·艾略特先生（100年前的老院长）用过的。”今天，教育日渐被理解为一种消费和服务，大学生也早已不再轻易接受教师的训导。但在哈佛，人总会收敛一点。

在哈佛的十来天里，我常在以哈佛广场为中心发散出的小街上溜达，会发现些不经意的符号，泄露出剑桥镇的蒙古心理。“剑桥”和“牛津”的街名，就已经够怀旧了。而那些在别的州难觅踪迹的皮鞋修理店、皮革打理店，摆放着焦油肥皂和雪茄的礼品店，总之，老玩意儿，就如地毯的线边一样，暗示着出没于此的一些人的品位与生活方式。

20世纪30年代，当哈佛从一个新英格兰地区的学院变为一所真正的大学时，哈佛本科生院的社会地位很贵族化。它掌握在波士顿的银行家、律师或政治家族手中，不以严肃的学术闻名，而是世俗的名利场。当时哈佛的教师很多是社会名流：他们首先是一名绅士，其次是一个教师，最后才可能是一位学者。学生绝大多数来自新英格兰与纽约，或是住在哈佛“金色海岸”（比如亚当宿舍楼）豪华公寓里的富家子弟。学院教育是闲人雅客式的，比如学习古典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体验学问的旨趣，熏陶审美和心灵。